

论计划生育与人权

陈 剑

一 如何看待人权和人权保障的实现

人权问题实际上涉及到的是一个伦理学问题。确切地说,涉及到的是规范伦理学的问题。因为规范伦理学要回答的问题是,我们应该做什么。换句话说,我们应该根据什么原则安排我们的生活。不同的文化、不同的意识形态,对“应该”有着完全不同的理解。对某一行动、某一做法,不同的社会形态,由于基本价值观念的不同,也会产生完全不同的认识。

说计划生育违反人权,是基于生儿育女是人的权利这一认识。问题在于,生儿育女确实是人的权利之一,但维持人类自身的生存也是人的权利之一。联合国大会1948年12月10日通过并宣布的《世界人权宣言》第三条指出:“人人有权享有生命、自由和人身安全”。当人们要生儿育女的权利与人类要生存、享有生命的权利发生冲突时,该选择谁呢?换句话说,当前一种权利的实现对另一种权利的实现构成威胁时,哪一种权利更值得尊重呢?这个问题的答案是不难回答的。

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文化也比较落后。1949年至1989年,中国人口从5.4亿增长到11亿以上,在40年时间里增长了一倍多。中国人口的急剧增长,已给中国的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带来了巨大压力。仅以人口与耕地、人口与粮食的关系来说,中国耕地面积只占世界的7%,却养活了世界近22%的人口;中国的播种面积只有美国的70%,却供养了比美国多4倍的人口。近10年,中国人口增加了一亿多,而耕地减少了5500多万亩,人均耕地从

1949年的2.7亩下降到1987年的1.38亩,只及世界人均耕地水平的1/4。据预测,到2000年,全国耕地总面积可能降至13.61亿亩,人均占有耕地仅为1.06亩左右。而耕地的短缺又直接制约了中国粮食的生产。从1952年到1988年,中国粮食总产量翻了一番,但人均占有量仅提高了26%。1984年以来,人均粮食占有量逐年减少,已由1984年的394公斤下降到1988年的362公斤。1990年粮食总产量虽达到4.35亿吨,超过了1984年的历史最高水平,但人均占有粮食量仍不及1984年的水平。本世纪末,不用说使人均占有粮食量达到一个新水平,即使保持现有水平难度也是很大的。粮食是人类最基本的生活资料,是人类生存的必要条件。但在耕地面积日益缩减,而提高粮食单位面积产量的潜力又很有限的情况下,中国将会长期为粮食短缺的形势所困扰。除此之外,中国的自然资源相对不足,庞大的人口数量对森林、水资源、草原以及其它资源的压力也相当大。由于人口过快增长,相当多的国民收入用于新增人口的消费。从全国看,每年新增人口1600多万,几乎要消耗掉25%左右的新增国民收入。这样,国民收入中用于发展经济的比重就很有限,我们不得不用相当多的精力去解决人们的第一需要,即生存需要。解放以来,中国人民在政治上翻了身,成了国家的主人,但从农业的发展情况看,也只是基本解决了人们的温饱问题。截止到1989年,全国仍有7000多万人的温饱问题没有解决。因此,为了解决人们的温饱问题,使其尽快脱离贫困和维持自身的生存权利,中国政府在

发展经济的同时,采取了大力控制人口增长的措施。这一人口控制措施,正是为了尊重人权,保证前期人口最基本的生存权利得以实现。试想,如果中国不是从70年代初就推行计划生育,而是任凭人口无节制地生育,那么,中国大陆现有人口就会不是现在的11亿多,而是13亿多。如果那样,中国人口给经济和社会发展带来的压力就将更大。全国不得温饱的人口将会更多,大批人口陷于贫困状态,难道是合乎人权的吗!

二 不同的利益如何选择

中国的计划生育并不是剥夺人们生儿育女的权利,对一些因疾病或生理原因不具有生育能力的人,政府还千方百计为他们解除疾病的烦恼,创造条件使他们恢复生育能力。国家只是要求人们有节制地、按照生育政策、有计划地安排自己的生育,选择节育方式。

生儿育女孤立地看,只是个人和家庭的私事,因为生育是两性间的事,是在家庭范围内实现的。但从社会范围分析,生儿育女完全是一种社会行为,涉及个人、家庭和社会诸方面的利益。这些利益,有时是一致的,有时则是矛盾的。当一国人口众多,且生产力水平较低时,如果人口不加节制地生育,就会给经济和社会发展带来很大压力,并将影响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进程。当个人、家庭利益与国家、社会的利益发生矛盾时,就有一个利益选择问题。这就需要对不同的利益进行判定,需要用最大多数、最大利益原则排列不同利益的轻重缓急和先后次序。哪一种利益涉及到最大多数人,哪一种利益最大,就应选择哪一种。在不同的利益冲突情况下,即使按照上述原则,有时也很难判定何为“应该”。因为奉行不同的伦理观念,就有可能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在西方国家,个人利益至上,个人利益大于集体利益和社会利益。按照西方社会的伦理观念,就会把个人、家庭利益作为选择“应该”的依

据。在中国,奉行集体主义观念,以社会的、集体的利益为重,并认为,社会的、集体的利益与公民个人、家庭的长远利益和根本利益上是一致的;把社会的利益、集体的利益放在首位,也就是把公民个人和家庭的长远利益放在首位。但个人、家庭利益与国家、社会的利益也是有矛盾的,特别是在一些眼前利益方面,这就有一个利益选择问题。当然,过多的生育,不仅对国家、社会利益不利,对个人和家庭的利益也是不利的。但如果是适量生育,即一个家庭生育2~3个孩子,就存在利益选择问题。因为适量生育,对国家和社会不利,对个人和家庭则有可能是有利的。我们不能泛泛地说,个人和家庭利益必须一定要服从国家和社会利益,而且不分情况和场合,国家和社会利益绝对大,个人与家庭利益绝对小,可以忽视;只应当说,在已经顾及到个人和家庭的切身利益的前提下,当个人、家庭利益与国家、社会利益发生矛盾时,就要求每个公民以国家和社会的利益为重,按照国家的生育政策进行生育,这应看作每个公民神圣的义务。中国宪法第49条规定:“夫妻双方有实行计划生育的义务”。每个公民都必须履行宪法规定的义务,自觉实行计划生育,而无权不实行计划生育。这一规定与《世界人权宣言》的精神也是一致的。《世界人权宣言》第29条指出:“人人对社会负有义务,因为只有在社会中他的个性才可能得到自由和充分发展”。同时还认为“人人在行使他的权利和自由时,只受法律所确定的限制,确定此种限制的唯一目的在于保证对旁人的权利和自由给予应有的承认和尊重”。生育是人们的权利,但人们在行使这种权利时,应受《宪法》有关条文的限制。不然,就有可能妨碍他人的权利和自由的实现。如果把这看作是对人权的侵犯,实质上是对我国《宪法》的指责。

1984年8月在墨西哥城召开的国际人口

会议，通过了《进一步执行世界人口行动计划的建议》。该“建议”写到，夫妇和个人在行使他们的生育权利时，“应该为考虑他们自己的情况以及他们的决定对其子女和他们所生活的社区社会的平衡发展有何影响”。在中国人口数量对经济社会发展带来巨大压力的情况下，人们在行使自己的生育权利时，必须要考虑到中国人口众多对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巨大压力。

三 人权的实现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人的权利实现程度，与一国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水平密切相关，和生产力水平呈正相关关系。《世界人权宣言》指出，世界人权宣言“作为所有人民和所有国家努力实现的标准，以期每一个个人和社会结构经常铭念本宣言，努力通过教诲和教育促进对权利和自由的尊重，并通过国家和国际的渐进措施，使这些权利和自由在各会员国本身人民及在其管辖下领土的人民中得到普遍和有效的承认和遵行”。应当注意这里“渐进”两字的含义。人权的实现需通过一国经济社会的渐进措施，它本身受一国经济社会发展条件的制约，是一个日积月累、逐步完成的过程。

一般说来，在同样的社会制度下，一国经济文化发展水平越高，人权得以实现的条件就越充分；当一国经济文化发展水平较低时，人的一些权利和自由的实现就会受到社会经济文化发展水平的制约。比如，《世界人权宣言》第24条规定了“人人有享受休息和闲暇的权利，包括工作时间有合理限制和定期带薪休假的权利”。但在人们的温饱问题还没有解决的情况下，上述权利就难以得到充分实现。要实现前一种权利，就有可能影响人们温饱问题的解决。此时，由于条件不具备而无法实现的权利，或者条件不具备而应限制的权利，就必须让位于人们基本权利的实现，当然不能说这是侵犯人权，而应该说，这正是对人的基本权利的尊重。

从中国人口控制工作所取得的成效看，中国自70年代初实现计划生育以来，取得了巨大的成绩。近20年时间，中国少生了两亿多人口，为国家和社会节约了巨额的抚育费，极大地缓解了中国人口对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压力，对经济社会发展起了直接促进作用，也直接有利于人们的物质文化水平的提高，有利于人民的一些基本生存权利的实现。应当理直气壮地说，中国的计划生育，不仅没有侵犯人权，着眼点正是为了使人的基本权利得以实现。从取得的成效看，中国的计划生育为人权的充分实现创造了必要条件。

中国是一个有着11亿人口的国家，各地经济文化的发展很不平衡，全国农村人口的文盲、半文盲就有1.8亿，其中绝大多数是女性。而计划生育工作本身是一项涉及到亿万家庭的利益，需要把亿万群众的生育行为纳入到国家宏观的人口计划中去的艰巨复杂的工作。要做好这项工作，需要通过耐心细致的说服教育，为育龄夫妇提供各种避孕药具服务，帮助群众排忧解难等等。如同其它工作一样，由于干部认识水平和工作水平的差异，这项工作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出现一些缺点和问题应看作是正常的。为了改进工作，提高工作水平，我们自己也在不断批评和揭露自身存在的一些缺点和错误。对揭露出来的缺点、错误，一经发现，就要求各地予以纠正；对工作方法简单，在工作中违反组织规定的个人，除批评教育外，严重的还给以必要的纪律处分。如果把我们已经纠正或正在纠正的缺点作为攻击中国推行计划生育的依据，只能说明攻击者别有用心，这是我们不能接受的。

四 控制人口是世界性潮流

一些西方国家把中国实行计划生育看作侵犯人权，用他们的那一套价值观念对中国内政说三道四，实际上是要人们强行接受西方的那套价值观念。1984年8月在墨西哥城

召开的世界人口会议确认：各国人口政策属于各国主权范围，是每个国家有权自己决定的事情。这一原则得到与会各国的普遍赞同。西方一些国家的人士对中国主权范围的事情加以指责，实际上就是干涉中国的内政。

随着世界人口的急剧增长，以及由此给世界资源、环境等方面带来的种种压力，已使愈来愈多的国家开始对自己国家的人口发展进行主动干预，控制人口已成为世界性潮流。1965年，世界上仅有21个国家支持计划生育工作；到1974年已有2/3的国家支持计划生育工作；1983年，受联合国监督的166个国家中已有127个国家支持计划生育工作。这些国家的人口总和，已占全球人口的90%以上。控制人口作为一种世界性潮流，反映了人类文明进步的趋势。中国作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两者存在尖锐矛盾。为使自已尽快发达起来，尽快摆脱贫穷走向富裕，中国政府在发展生产力的同时，努力控制人口。中国的人口控制不仅大大缓和了人口与经济的矛盾，同时也为控制亚洲和世界人口增长作出了贡献。中国的人口控制主要依靠宣传教育，依靠各种技术服务，

知识服务、生产和生活服务；通过向群众提供各种避孕节育措施，并根据各地情况。在生育政策上实行分类指导。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并不是要求所有的夫妇只生一个孩子，对农村中一些有困难的家庭（在许多地区包括独女户）允许在间隔条件下生育二胎，对少数民族的政策适当放宽。中国控制人口的做法和控制人口所取得的成效，得到了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和国际性组织的理解和支持。西方一些国家对我国计划生育政策及其做法进行了种种攻击，是有自己的目的的。

邓小平同志曾明确指出，有少数外国人骂中国的人口政策，他们的真正用心是要中国永远处于不发达状态。中国有中国的情况。中国的人口如果不加控制，到本世纪末就会达到15亿，人口的增长会超过经济的增长。因此，中国的人口政策是带有战略性的大政策。中国对人口的增长实行严格控制，是从我们切身利益出发的，实行计划生育，可以使中国更快地发达起来。

（本文责任编辑：汪正鸣）

（本文作者：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宣教司）

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

关于推荐订阅《中国人口科学》、《中国人口年鉴》等人口学期刊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解放军、武警部队、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计划生育委员会，中央直属机关、中央国家机关计划生育领导小组办公室：

《中国人口科学》（双月刊）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研究所创办的、层次较高影响较大的全国性人口专业期刊。该刊自1987年8月创刊以来，以其较高的学术水平、广泛的研究领域、严肃的学风、理论联系实际和深入的对策探讨，受到联合国人口基金和国内外人口学界的高度评价，并由美国阿伦顿出版公司出版英文版在世界各国发行。该刊对提高广大计划生育干部的人口理论水平、加强理论和业务建设及对实际工作的指导，都有直接的帮助。

《中国人口年鉴》（每年一册）是该所创办、在国内外发行的我国第一部大型人口资料工具书，按年度介绍国内人口文献、人口普查和统计资料、各省的人口发展、计划生育情况、中外人口对比、人口科研机构，以及人口活动内容，是计划生育部门必备的专业资料工具书。目前已出版1985~1990年各册。

《中国人口科学》和《中国人口年鉴》均由中国社科院人口所自办发行。请你们根据实际情况，组织各级计生委订阅上述两种期刊和其他你们认为对工作有指导作用的人口学期刊。

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办公厅

1991年4月13日